



学衡尔雅文库  
主编 孙江

王东杰  
著

# 国语

民族主义

以国家为前提

言文一致

以文字统一声音

代表全国

onal Language

非外借

方言就是古语

“不统一”的国语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

南京大学文科“双一流”专项经费资助

# 国语

王东杰  
著

National Langu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王东杰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1

(学衡尔雅文库/孙江主编)

ISBN 978-7-214-25759-8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史—研究—近代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28323 号

|      |                            |
|------|----------------------------|
| 书 名  | 国 语                        |
| 著 者  | 王东杰                        |
| 责任编辑 | 汪思琪                        |
| 装帧设计 | 刘 俊                        |
| 责任监制 | 王 娟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5.5 插页 6                   |
| 字 数  | 106 千字                     |
| 版 次  | 2023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2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25759-8     |
| 定 价  | 36.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张凤阳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恒 陈力卫 方维规 韩东育 黄东兰

黄克武 黄兴涛 刘建辉 罗志田 麻国庆

马 敏 桑 兵 沈国威 孙 江 王中忱

杨念群 张宝明 张凤阳 章 清

主 编 孙 江

副 主 编 李里峰 李恭忠

编辑助理 王 楠 王瀚浩

回看百年前的中国,在20世纪之初的十年间,汉语世界曾涌现出成百上千的新词语和新概念。有的裔出古籍,旧词新意;有的别途另创,新词新意。有些表征现代国家,有些融入日常生活。

本文库名为“学衡尔雅文库”。“学衡”二字,借自1922年所创《学衡》杂志英译名“Critical Review”(批评性评论);“尔雅”二字,取其近乎雅言之意。

本文库旨在梳理影响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词语和概念,呈现由词语和概念所构建的现代,探究过往,前瞻未来,为深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块基石。

# 目录

|    |     |
|----|-----|
| 引言 | / 1 |
|----|-----|

|               |     |
|---------------|-----|
| 第一章   作为概念的国语 | / 5 |
|---------------|-----|

|              |      |
|--------------|------|
| 第二章   国语运动简史 | / 17 |
|--------------|------|

|               |      |
|---------------|------|
| 第三章   以文字统一声音 | / 45 |
|---------------|------|

|             |      |
|-------------|------|
| 第四章   国语与国民 | / 65 |
|-------------|------|

|                   |      |
|-------------------|------|
| 第五章   为中国语言争得国际地位 | / 87 |
|-------------------|------|

|              |       |
|--------------|-------|
| 第六章   方言还是语言 | / 109 |
|--------------|-------|

|                 |       |
|-----------------|-------|
| 第七章   “国语不统一主义” | / 131 |
|-----------------|-------|

|        |       |
|--------|-------|
| 主要参考文献 | / 153 |
|--------|-------|



民族主义是形塑近代世界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使得一个民族成为民族的要素是什么？学界一向莫衷一是。语言是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提到的因素：尽管在事实上，民族和语言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但在理论上，语言往往被视为确立民族边界的主要标志和抟聚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政治版图的变化，通常也伴随着语言版图的变化。那些在此之前只存在松散连接的族群，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必须首先统一他们的语言——各种彼此歧异的方言势必影响人们之间的沟通、合作，也不利于唤醒/创造“我们是一个”的共同感。<sup>①</sup>制造统一的民族语言的运动，即是所谓“国语运动”。它或者是将某一既存的强势方言提升为整个民族（国家）的标准语或共

---

<sup>①</sup> 参看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宝树园文存》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通语，或者是在其语言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作为一个普世性的现象，国语运动几乎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经历过的。

中国的国语运动从晚清开始，历经民国时期，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被推广普通话运动所代替（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推广普通话运动亦可视为国语运动的延伸）。这本小书的目的是从（广义的）概念史角度对此运动做一简单梳理。不过，本书并不准备以叙事为主要手段，而是采取问题导向方式，对国语运动中几个彼此相关的重要议题加以深入剖析，以图多方位呈现国语运动的整体面目。在结构上，本书前两章分别简述国语的概念史和国语运动的推行史，第三至第七章则是专题史的讨论。我希望借此小书，从语言这样一个特殊侧面，深化我们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省思。不过，因为篇幅的限制，许多话题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我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一书。



## 第一章

### 作为概念的国语

“国语”二字本是中文固有，但我们今天所习用的“国语”，却是 19 世纪末从日语引入、20 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新词汇。古今“国语”二字，形式如一，而内涵不同——这一点下文还要具体讲到。此处想指出的是，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的国语是由明清时期的官话演变而来的，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又被普通话所取代。“官话”“国语”“普通话”，所指（大致）相同，只是不同时代通行的不同称呼而已。这么说当然不无道理，但仔细考察也可以发现，它们在语义上存在着诸多微妙差别。这种差别不能只归结于不同时代表述习惯的不同。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看，其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信息。

20 世纪中国人使用的“国语”一词，内涵相当复杂。从我所阅读的文献来看，以吕叔湘在 1944 年的一段总结最为简洁而全面。他将“国语”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相当于‘中国语’，别于外国语而言”；其次，“等于‘标准语’，别于其他方

言而言”；最后，小学教育中的科目——“国语”，实即语体文或白话文。<sup>①</sup> 这里暂且不讲白话文的问题，仅从前两个义项看，“国语”和“官话”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官话”的主要区分对象是“方言”（此处的“方言”取其现代意义，下同。具体论述参考本书第六章），而非“外国语”。第二，同是与“方言”相对，“国语”是“标准语”，“官话”最多却只可说是“共通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语”；换言之，“国语”的标准是唯一的，“官话”则更为多元。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明清两代朝廷都公布有官话标准，在明代是《洪武正韵》及其修订本、《韵会定正》，在清代是《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不过，论者也承认，这些标准“仅仅被停留在理论上”，人们所依循的实际是“自然的‘社会约定性’”。<sup>②</sup> 《洪武正韵》等是否可以看作语音标准，容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所谓“官话”乃是自然形成的共通语，更恰当地，不如说是一组语言的共名。现代语言学家一般把官话分为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三大系统；每一系统内部又可做进一步区分，如北方官话就包括了华北官话、西北官话等。在各种官话中，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分别被视为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的代表语言（注意不是标准语

①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载《吕叔湘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4页。

② 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270页。

言)。此外，在更为日常的认知中，各个地区也多会有自己的“官话”。因此，虽然都号称“官话”，但任意两种官话之间的差异可能是非常大的。钱玄同曾说：“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通行的区域很广，然而夷考其实，是全无标准的。我们简直可以说，凡官话都是‘蓝青官话’。”<sup>①</sup>这是不错的。官话既有一定的共通性，又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故时人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官话”，见解非常不同。“国语”就不一样：其语音、语法标准都是唯一的，可以区分“正确”与否；语汇的使用当然要灵便得多，而且时时处于变动之中，但大体标准仍是可以确定的。

第三，在应用范围上，官话和国语也不相同。中国历来重视文字而相对轻视语言（参看第七章），在语音标准方面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在近代之前，比确立标准语更重要的是“正字”和“正音”，二者都围绕文字展开；前者注意的是字形，后者注意的是字音。比如，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著《輶轩语》中就有“读经宜正音读”一条，云：“古时九州语言不同，而诵诗读书同归正读。”<sup>②</sup>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正音”针对的只是读书，不管口语。这代表了官方的普遍态度。而读书音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的读书音都受到本地方音的影

---

①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载《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② 张之洞：《輶轩语》，载《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80页。

响。不过，也因为有《音韵阐微》一类“正读”标准的控制，各地读书音多少呈现出一种向心性，彼此能够接近。至于现代所谓“国语”，则除了要求“读书音”一致外，还特别地要求“口语音”的一致。

学者讨论中国国语运动的“前史”，往往会提到清雍正六年（1728）八月六日的一份上谕：“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但福建、广东两省之人讲话多有乡音，难以通晓，以致“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sup>①</sup>为此，雍正皇帝要求闽、粤两省设立专门的正音书馆，“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sup>②</sup>。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表现出一定的“语言统一”意识，不过，它离现代的“国语”意识仍然距离甚远：首先，这份上谕所针对的主要是官员士子，而非普通民众。其次，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其他地区也没有类似的建制。这和理论上应是全国人民皆应掌握的国语（即使不会说，至少也要能懂），性质完全不同。最后，其施行效果也不佳，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第四，官话与国语在学习形式和学习渠道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官话是通过人和人的交往而自然习得的。比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② 俞正燮：《癸巳存稿》，载《俞正燮全集》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369页。

如，晚清浙籍退职官员孙锵鸣 1887 年写信给远在京城两个儿子，教他们怎样学官话：添用几个北方的仆人，听得多了，再大胆开口，“官音自然说熟”，即使带些地方口音也不妨事。<sup>①</sup>自幼生长于北京的孙宝瑄也说，自己的北京话是从小与“家中所用北方女姬”相处，“熏习而来”。<sup>②</sup>此外，看小说、听京戏，也都是学官话的渠道。国语则自一开始就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1904 年，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即使是本国话，“也要到学堂里去学”。中国方言繁杂，没有国语教育，将国不成国。<sup>③</sup>这和自然习得官话的过程，相去甚远。

第五，官话和国语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差异，就体现在“国”这个字上。1935 年 2 月，北平市社会局局长在无线电台一次宣扬国语教育的演讲中提到，所谓国语，“就是普通所说的官话”，惟“国语的意义更深远，范围更广大罢了！”“语字上加了一个国字”，便“明明白白”地“限制出使用的地方”，即限于一国之内。更重要的一点是，“单提国语二字，意义还不算十分明白，必须说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语，方能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分别清楚”。故“国语”二字，“和国教、国防、国

---

① 孙锵鸣：《谕孙诒泽书》，载《孙锵鸣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3—304 页。

② 孙宝瑄日记（1902 年 11 月 6 日），载《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88 页。

③ 三爱（陈独秀）：《国语教育》，载《安徽俗话报》第 3 期（1904 年 5 月 15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影印本，第 19 页。

都、国货的标题一样”，重在对内统一、对外区隔。在这种意义上，国语教育或可比作“国防教育”；这二者“性质有点近似，不过一个是对内的工作，一个是对外的的工作罢了”。一句话，国语的核心是“国”：“国语的建设，是以国家为前提的。”<sup>①</sup>

这一段提示我们，官话和国语的根本差异，需要从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寻找。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士子、商人阶层中，多少具有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作为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然习得的语言，它也无须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国语却根植于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明确自觉（用陈独秀的话说，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其区别功能主要在对外一面，至于对内，则重在统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民，而非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国语”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也正因此，和官话的“自然性”不同，国语必须经过相关政府部门正式颁布，带有很强的规划色彩。

因此，官话虽为国语提供了一个语言基础，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清末一位作者就说，我国之国语乃“从新建立者”，即应选聘专家，择其适当，确定

---

① 《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未署名，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